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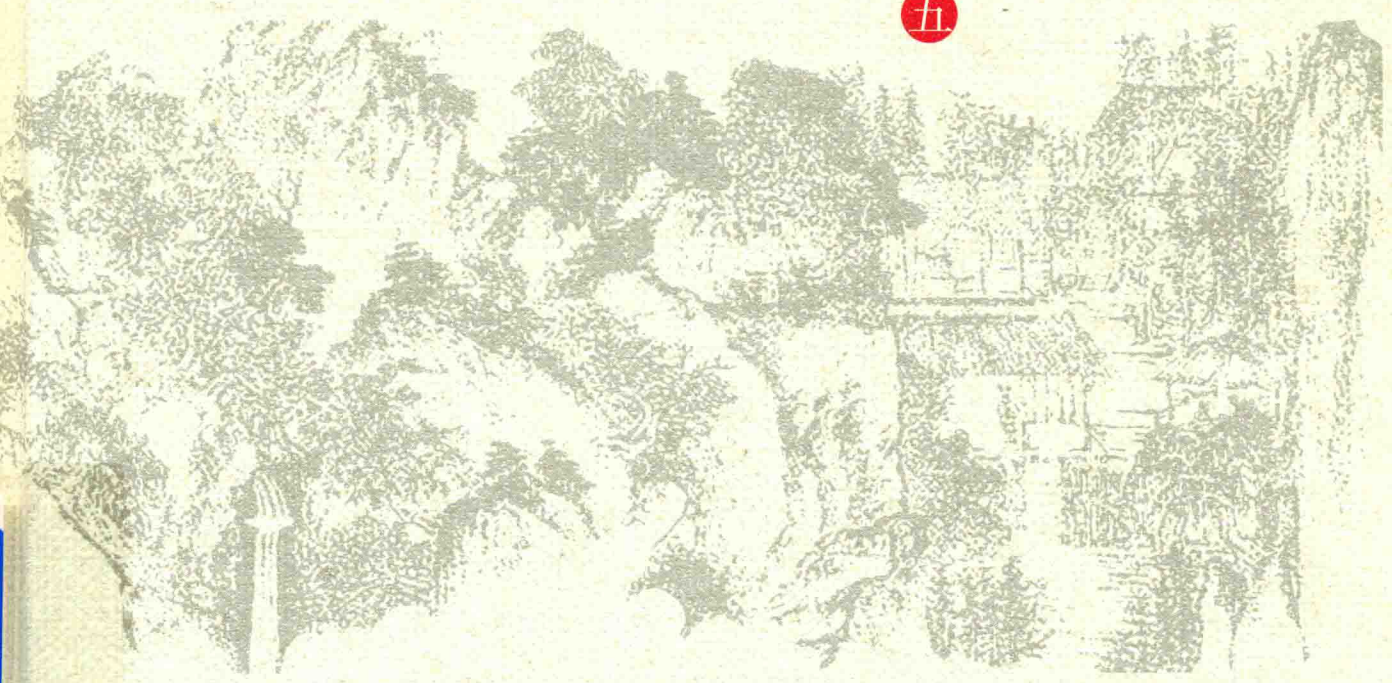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五辑

思想大要 卷五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五辑

思想大要 卷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五辑,思想大要:共5卷/
詹石窗总主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ISBN 978-7-5439-7226-1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746号

选题策划:张 树

责任编辑:张 树 苏密娅 杨怡君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五辑《思想大要》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171.25 字数 3425000 千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7226-1

定价:3850.00元(全5册)

<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五辑

思想大要

卷五

分辑主编◎江

峰

编校◎夏

慧

周

帆

周

平

叶

思

《思想大要》卷五·道家道教军事、 经济、教育及其他思想 目 录

道家道教军事思想

《阴符经》军事思想浅窥	于汝波 (3)
《管子》的军事思想体系	黄朴民 (7)
论鹞冠子的军事思想	杨兆贵 (14)
战国黄老学派及其军事思想	黄朴民 (22)
王真的道家用兵之道	何建明 (30)

道家道教经济思想

黄老学派经济思想初探	彭正穗 (37)
先秦儒道经济思想比较论	唐任伍 (45)
《老子》经济思想探异	孙 引 (54)
关于《老子》经济思想初探	朱森溥 (61)
老子思想与市场经济	项文静 (66)
老子《道德经》的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文胜 马跃如 (70)
论老子思想对企业经营哲学的启示	王 鹏 刘桂林 (75)
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的经济思想	马 涛 (80)
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几点困惑的反思 ——基于老子道学思想的解析	熊海帆 (85)
老子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郭金鸿 (93)
老子经济思想探讨	刘雅文 (101)
论整合营销传播的循环统一 ——从老子辩证哲学思想的角度解读整合营销传播理论	许伟杰 (107)

弱势企业强势之“道”

——论老子守柔思想对我国弱势企业战略制定的启示	胡亚林 (113)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朱义明 (119)
杨朱经济思想辨析	路兆丰 (126)
试论道教经济思想的渊源	石磊 (133)
道教对发展及经济生活的理解和启示	张继禹 (139)
道教善书思想对明清商业伦理的影响	
——以《太上感应篇集注》为例	姜生 (142)
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	张坤 (147)
《太平经》的三种“财富观”管窥	张坤 (152)
《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管国兴 钟海连 (156)
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	汪锡鹏 (162)
简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	贾明远 (169)

道家道教教育思想

论老子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李正洪 (175)
论道家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吕锡琛 (181)
老子的哲学思想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	
——兼谈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比较教育的建设性意义	王长纯 (187)
论《管子》中黄老道家“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	米靖 (193)
老子教育思想的社会功能分析	张长虹 (200)
论道家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唐劭廉 周敏 (205)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教育思想的当代合理性阐释	唐劭廉，吕锡琛 (210)
论道家思想对和谐社会教育的启示	杨桂兰 (221)
先秦道家老子自然主义教学思想的现代诠释	闰守轩 林苑 (225)
老庄教育心理思想研究	燕国材 (230)
道家“反向”教育思想探究	陈文华 (240)
《淮南子》中的教育思想	廖军和 (246)
列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白娴棠 (251)
论庄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魏萍 徐照波 (256)
道教教育考述	詹石窗 (259)
试论《太平经》教育思想的人性论依据	张鸿 (265)
《老子想尔注》教育思想简论	瀚青 (271)
《西升经》的教育思想探微	李忠 (281)

论葛洪的道教教育思想	李 军 (290)
全真教王重阳教育思想研究	申喜萍 (299)
王重阳人才教育思想分析	史冰川 (304)
论杜光庭的道德教育思想	刘 蔚 金 易 (309)
王常月的道教教育思想	孙石月 (314)
刘一明道教教育思想初探	宋宁鹏 孙石月 (317)

其他思想

《老子》与中国“女性哲学”	程伟礼 (325)
熊十力哲学人生论中的道家思想资源	杨丹荷 (333)
浅论老子的和合思想	李汉相 (340)
海德格尔论老子与荷尔德林的思想独特性 ——对一份新发表文献的分析	张祥龙 (348)
论和生理势与“和谐世界”	罗尚贤 (363)
道家语言传播主体的求真意向	谢清果 (370)
从“道”的命名看老子的语言哲学思想	黄 敏 (375)
“和谐世界”：中国“和”哲学与持久和平 ——以对道家、儒家、墨家“和”哲学的分析为中心	肖 刚 (379)
由道向德 ——《道德经》和谐思想的四个进阶	裘 梧 (388)
让生命在和谐中升华	张继禹 (391)
浅论《道德经》的和谐思想 ——兼论与佛法的相通之处	释觉光 (395)
《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赖保荣 (398)
道家和谐思想管见	张振国 (402)
道和：通往和谐之路	牟钟鉴 (408)
试论老子《道德经》思想对于构建人类和谐社会的意义	卿希泰 (411)
语言与终极 ——老子、慧能于此的哲学追问	朱丽霞 (415)
老子“自然”观中的和谐思想	张俊相 (422)
论道家文化的和谐体系	陈水德 (428)
在“名”与“道”的曲通处 ——老子语言观探要	陈洪杏 (435)
道家文化与和谐文化构建	刘雅文 (444)
对道教义理规范中“积极因素”的探讨	李养正 (450)

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	牟钟鉴 (457)
加强道教教义思想的研究, 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	
——从《病科学》说起	陈耀庭 (461)
践行生活道教 德臻人间仙境	
——关于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	张继禹 (464)
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	陈霞 (474)
道教的妇女观	王宜峨 (479)
道教传统教义思想的现代诠释	盖建民 (481)
论生活道教	詹石窗 (484)
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	詹石窗 (492)
道教劝善书的和谐理念	
——以《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为例	周波 邢海晶 (500)
论《太平经》的妇女观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孙亦平 (506)
《太平经》的绝对超越思想及其内在局限	陈林 (513)
试论《太平经》关于天地人“三合相通”	
与“中和”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卿希泰 (522)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五辑

思想大要

卷五

道家道教军事、经济、
教育及其他思想



道家道教
军事思想

《阴符经》 军事思想浅窥*

于汝波**

《阴符经》，又名《黄帝阴符经》，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尚难确考。“阴符”作为书名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得周书《阴符》”，均不称“经”。《新唐书·艺文志》“神仙”类中最早著录《阴符经》。历代学者对其成书年代及作者说法颇多，但均缺乏有力证据。现有唐褚遂良手书《阴符经》碑帖行世。《阴符经》可以肯定是唐以前书，其作者可能是一位多经世变、博学善察、政治上有“离经叛道”倾向的隐士。书写成后，可能长期隐埋，至隋、唐之际始流行于世。

此书版本甚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300或300余字本，一类是400余字本。文字简练，哲理深奥，几乎每句话都可敷衍成一篇文章；但通观全篇，却又贯通一气。此书自问世以来，多被史籍著录于道家类书中，为之注疏者也大都是些道家文人，因此，被涂上了浓重的道学色彩。但它在哲学思想上坚持自然天道观，反对天命论；着力揭示自然和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必然性及其内因和外因，讴歌矛盾和斗争，与道家的贵柔思想截然不同。书中虽有养生之类的话，但多是隐喻，其意在论述政略和兵略思想。全书更无神学异说之词。应当说，这是一本融合了易、老、阴阳、法、兵等诸家思想因素、谈论王政和兵法权谋的书，可称其为道兵书或政兵书。

本文对其军事思想试作管窥，以期抛砖引玉。

一、人主、将帅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暗合“天道”

此书何以名为“阴符”？李筌说：“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黄帝阴符经疏》）“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似应为“行事之机暗合于天机”，即论述人主、将帅的思想和行为与“天道”暗合的奥秘，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该经开篇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是讲人主、将帅必须精心观察进而准确掌握客观自然法则（“天道”），使自己制定和实行的政治、军事等谋略计策与之相暗合，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切都有

* 本文原载《军事历史》1990年第2期，第43-45页。

** 于汝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了。“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运天下于掌上，应万变于无穷。而只要注意观察研究“天道”，就会发现，天和人都会有发出“杀机”之时。“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变定基。”这就是说，由于自然和人事的原因，社会会经常发生变革，人主、将帅察知此机，就应乘之而动，达到“万变定基”之目的。《六韬·发启》载太公对文王说：“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这里说的“天殃”“人灾”，可能是《阴符经》中讲的“天”和“人”发出“杀机”的一种形式；“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正是“天人合发，万变定基”思想的体现。“日月有数，大小有定”，不是人的意志能够左右得了的，但这决不是说，人主、将帅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唯其“有数”“有定”，才使“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中含有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规律只会给能者以自由之意，表现了作者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人主、将帅能做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就可以治理属下，战胜敌人，实现自己的意志，亦即所谓“立天之道以定人”了。这是全书的总纲，或者说，是其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

二、剧烈的社会变革乃至战争不可避免，只能“因而制之”

《阴符经》的作者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述他的这一战争观的。他似已意识到，事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文中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自然生养万物，但亦杀害万物，这都是正常的，是“天道”的自然之理，无须大惊小怪。又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万物盗天地阴阳之气而生长，人盗万物以养身，万物亦生灾患以盗人。他（它）们之间是相害而又相利的关系，唯其相“盗”，故能相依；唯其相“杀”，故能相生。事物之间的这种互相“盗”“杀”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宜”（适时、有度、各得其当）。只要“宜”，“三才”（天地、万物、人）便可相安无事。作者用“盗”“杀”“宜”三字，突出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及矛盾中斗争性的一面。认为正是这种合“宜”的斗争，才使自然和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一见解无疑是相当精辟的。战争是人类相“盗”和相“杀”的最高形式，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这种“盗”和“杀”，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盗”和“杀”一样，也是契合自然天道的。只要“宜”，合于“天人合发”之机，杀伐有度，使“万变定基”，不但无碍于人类的发展，相反，还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人主、将帅“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既然是不可违，就只有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以达到“安”“三才”之目的。作者的这种思想与某些儒家学者只知笼统地否定和诅咒战争，而对战争的起因、战争的性质、制止战争的方法等缺乏全面分析研究的思想比起来，无疑要深刻得多。

三、主张以正御下，法、术兼施

《阴符经》强调人主、将帅治国治军要以正临下，法、术兼施，其思想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要加强自身修养，即重理智，轻物欲，不为邪枉所侵。“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

动静。”人身九窍有邪枉之动，主要来自眼、耳、口这“三要”，它可动摇人之“静”，因此，要特别把好“三要”之关。它告诫人主：要“食其时”，不要贪得无厌，征敛无度。又说：“至乐性余，至静性廉。”所谓“至乐”，谓久享天下之乐。《黄石公三略》卷下中说：“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乐人者，久而长。”即是此意。“至乐”者，其性宽容不苛。“至静”，谓不因物财挠心，不贪求淫奢，故其性廉洁。为了说服人主、将帅能做到这一点，作者讲了一句哲理颇深的话：“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生养万物，可谓至公；唯其至公，故能成其至私。至私者，最大最久之私也，谓天能永远做万物的主宰。可见，至公才是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最好手段，人主、将帅何乐而不为呢？

(二) 要有知人之术，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因为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对于属下，不能只看其表面而不察其本质，以致姑息养奸，自遗其咎。“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火从木生而焚木，奸生国内而毁国。故人主、将帅必须“知之修炼”，做到识微察机，知人“伏藏”，如此，则谓之“圣人”，可以做到圣明无误了。

(三) 要恩罚得当，反对滥施恩惠。“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意思是说，恩以害生，无害则无恩。如“置之死地”是“害”，如此能使之“生”，则是“恩”；人不经“害”则不知“恩”，不历严则不觉宽，故恩生于害，害又生于恩。滥施恩惠，会出现恩竭则慢等弊端；得恩过多者，又会因之骄奢而走向反面。故人主、将帅恩不可以妄施，罚不可以不行。这无疑来自法家思想。作者认为，真正的“大恩”是“无恩”，“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天地生万物，亦杀万物，一切按自然法则行事，无意施恩，亦不以恩者自居，故天下万物“大恩”之。

四、强调以奇用兵，“盗机”取胜

如果说《阴符经》讲的御下之道主要是个“正”字的话，那么，它的用兵思想突出的是一个“奇”字。“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迅”，讲的是速度，“烈”，说的是威势，速度加威势，以雷霆万钧之力骤然而至，会使敌人大感意外而目瞪口呆。作者以此启示将帅用兵要如迅雷烈风，在敌人震惊而不知所措时乘机击灭之。又说：“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人们知道了神之为神，则不足神矣，我反以不神对之，不神恰恰变成了神。此句告诫将帅，奇、正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运筹帷幄，临阵应敌，切不可墨守成规，要善于反兵法之常而用之。作者用“瞽者善听，聋者善视”为喻，说明“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的道理。要求将帅不因小利而分散兵力，并力一向，所向披靡，可抵十倍之师。这与《孙子》说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①的思想是相通的。作者认为，善用奇者，可以应变无穷，“爰有奇器，是生万象”，故能无往而不胜。

要以奇用兵，就要善于“盗机”。“机”，指的是关乎成败的关键条件，《阴符经》多处讲到它。重视对“机”的掌握和运用，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作者看来，“机”是神秘的，但又是可知的。将帅要得到它，就须善于窥、窃。“禽之制在气”，飞禽在空中飞翔，在其能因机制气。禽能盗气之机，人何不能盗事之秘？禽得气之机可以小制大，将帅得制敌之机，

^① 《孙子·虚实篇》。



怎不能以弱胜强？故机是可知的。作者认为，窥到机后，还有一个善不善于利用的问题。善于利用，可以因之成功；不善利用，反而会导致亡身。因此，在得机之后，要深谋精算，昼夜思虑，所谓“三返昼夜，用师万倍”。要严守秘密，“盗机”要使“天下莫能见，莫能知”，要利用好自己的“目”（谍报），使自己耳聪目明，对敌人则要使其变聋、变瞎、变哑。如此，就可以做到用兵以奇。

《阴符经》谈政论兵，用意深邃，词简义博，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如“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既讲到自然之理，又论及军政之道。从军政之道角度看，既讲要防止自己内部出现奸人细作，又启示人主、将帅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之矛盾。“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等，都具有相类似的意义。这些话似讲养生，而其义又在养生之外，其道理既适用于我，又可施用于敌。总之，《阴符经》给予读者的不是只能开某把锁的钥匙，而是制作各种钥匙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阴符经》也有其局限性。如，认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全部奥秘都在五行相克之中，是不全面的。书中多以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来隐喻政治、军事斗争的规律性，虽能给人以启迪，但毕竟自然和社会还各有其特殊规律，不能完全相类比，只采用这种类比手段，就限制了对理论全面、系统、准确的论述和阐发。

《管子》的军事思想体系*

黄朴民**

《管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为86篇，今存76篇，由西汉刘向编定。

《管子》一书数量繁富，内容庞杂，古今学术界对其书性质、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认识多有分歧，但基本的意见是认为其书虽托名于管仲，但大致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其中个别篇章保存了管仲本人的遗说。《管子》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包括了法、道、阴阳、儒以及兵、农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内容。尽管如此，《管子》一书还是有其主导思想的，这主导的思想就是法家思想，反映了当时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学派的理论要求和政治愿望。

齐国法家有它自己的思想特点：一方面强调法制，主张法不阿贵，要求以法律的力量来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重视民众的作用，认为礼义廉耻乃是立国的根本，强调将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齐国法家学派这些思想特征的形成，既与齐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有关，也同齐国建国以来长期延续的注重实用、博采兼容的文化传统相一致。它比三晋法家一味排斥道德教化，片面强调法制的做法，无疑具有更大的适用性，因而在后世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举凡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思想、作战指导原则，《管子》均有精辟深入的论述。与全书的哲学、政治思想折衷兼容倾向相一致，《管子》的军事思想亦具有调和、平允的特点，体现了先秦兵学逐渐走向综合融汇的历史趋势，从而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管子》的战争观理论

对于战争，新兴政治势力的思想代言人法家普遍采取肯定和拥护的态度。《管子》的作者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们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

*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第64-69页。

** 黄朴民，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三室副主任、博士。



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①《管子》指出，战争虽然谈不上高尚和道德，但在当时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不可或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所以，《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务必“积务于兵”，即注重和开展军事活动，指出假如“主不积务于兵”，就等于是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敌人，危险之至。基于这一认识，《管子》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它说：即便是在黄帝、尧、舜那样的盛世，都不曾废弃兵事，那么“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兵法》）？所以宋钘、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在《管子》作者眼中，纯属于亡国覆军之道，必须痛加驳斥了：“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立政》）从上述所列举的情况看，《管子》的基本立场是主战的。

但是与商鞅学派积极好战的态度截然不同，《管子》在充分肯定战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本身是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物也。”“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兵法》）一个国家如果屡次发动战争，就会使得士民疲惫；即使能够屡战屡胜，也会诱使统治者骄傲自大，到头来危及整个国家利益：“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兵法》）至于战争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危害，《管子》认为那更是十分明显的：“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八观》）所以战争尽管必需，但却要防止过分，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加以对待：“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重令》）鉴于这样的认识，《管子》在战争问题上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即便不得已而从事战争，也要争取一战而胜，避免旷日持久，损师疲民：“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幼官》）认为只有“德成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枢言》），才是正确的做法。

《管子》这种对待战争大事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是其作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认真借鉴其他学派战争观有益因素的产物。当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国家惨遭兼并的现实，使得其高度肯定战争的必要性。但是，魏惠王、齐湣王之流穷兵黩武招致丧师辱国的结果，又使得齐国法家认识到一味好战的危害性，因此主张慎战节兵。另外，齐国开放的学术文化传统，也使得齐国法家善于汲取其他学派的长处。这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表现为借鉴齐国兵学中的“慎战”主张以及黄老学派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提倡适可而止，防止过犹不及。

《管子》战争观上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它对战争性质的区分。《管子》认为，战争的性质可以划分为“义”和“不义”两大类。所谓“义兵”，就是“案强助弱，禁暴止贪，存亡安危”，就是“至善之为兵也，非地之求也，罚人是君也。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胜”（《幼官》）。所谓非义之兵，就是“贪于地”，“不兢于德而兢于兵”（《大匡》）。《管子》认为，战争的正义性乃是决定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所谓“行义胜之理”（《幼官》）。从事义战，方可“立于胜地”：“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

^① 《管子·参患》，以下引《管子》文者，只注篇名。

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王天下而莫之敢御也。”（《七法》）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管子》主张“竞于德”，而“不竞于兵”，强调用兵打仗要“举之必义”，即以正义战争对付非正义战争，从而实现“有义胜无义”的目的。同时，《管子》对非正义战争也进行了有力的贬斥，指出军队强大、士兵勇敢而战争性质“不义”，则等同于“伤兵”“残兵”，即所谓“勇而不义伤兵”。这种军队在战争中必然会遭到失败：“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七法》）即使偶尔侥幸取胜，也未必就是好事，“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七法》）。虽然《管子》对战争性质“义”和“不义”的区分，仅仅局限于抽象的道德判断的层面，而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有本质的不同，但是这毕竟表明当时思想家在战争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在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管子》的军队建设思想

《管子》的军队建设思想非常丰富，概括地说，它以“强其兵”为军队建设的核心任务，主张军事、政治、经济各种关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并把将帅队伍的建设、赏罚措施的完善、武器装备的改良、军事训练的健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管子》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就只有建设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它鲜明地提出了“强其兵”的主张，并将这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指出：“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重令》）“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

“强其兵”仅仅是军队建设的总纲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管子》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其荦荦大端有：

第一，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管子》认为要“强其兵”，首先必须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又说：“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以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重令》）而富国的基础则在于富民，“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侈靡》）。相反，不发展经济，国无畜积，民无余财，则不能强兵，而必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权修》）“众有遗苞者，其战必不胜；道有损瘠者，其守必不固。”“民饥不可使战。”（《八观》）《管子》这些正反两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这是非常正确的识见。在理顺“富国”和“强兵”关系的基础上，《管子》积极主张发展经济，力求在物质财富方面胜过敌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王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七法》）在农耕社会中，粮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所以《管子》又把聚财的重心落在“重粟”这一点上，强调：“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权修》）“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必生于粟也。”（《治国》）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的。

但是《管子》并不机械地将“富国”与“强兵”加以等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制分》）因此，它又从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着手，探讨了